

# 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

□白 烨

概要地来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在持续活跃的态势中平稳运行,在依流平进的发展中暗含异动。这种或显或隐的变异,既是文学自身不事声张的与时俱进,也是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生活的即时回应。这都向人们表明,我们的作家更注重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取生活,更在意以自己的感受去构筑故事,而普遍彰显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成果,总体上看,也表现出自觉的意识和自信的姿态,更为切近现实的生活,更为切近当下的时代。

从创作的走势与显现的特点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现实性题材创作势头强劲,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现实性题材与现实主义手法的齐头并进与桴鼓相应,构成了五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

现实性题材因要直面当下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并透过生活事象捕捉社会变动,引起人们的心理波动与精神异动,对作家解读社会、把握现实和生发故事等方面的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与挑战。近年来,作家们勇于接受这样的考验,敢于应对这样的挑战,以他们独特的生活观察和独到的艺术思考,在现实题材方面积极投入心力,不断开辟新的生面,由一个个人又启人的故事,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人们内心深处激起的种种涟漪。

乡土题材中,贾平凹的《带灯》、李佩甫的《生命册》、李栋梁的《上庄记》、东西的《篡改的命》、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王华的《花河》《花村》、李凤群的《大风》、周道璞的《多湾》等作品直面乡土社会的艰难蜕变与生活形态的急剧转型,或写艰窘生存中的精神坚守,或写乡民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浅吟低唱的叙事与如泣如诉的语言中,描述出当今中国乡村在各种因素推动下,从外在风光到内在情绪的悄然变动及其多彩图景。

都市题材中,刘心武的《飘窗》、苏童的《黄雀记》、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温亚军《她们》等以当下都市为场景,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快乐,也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烦恼。都市与历史、都市与人性,在这些作品中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呼吸相通、命运与共。廖东明的《太阳城》、余红的《琥珀城》则以都市城建过程中的矛盾纠葛为线索,揭悉了地产传奇中的社会问题与人性痼疾。这里使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以都市小人物为主角的两部作品:陈彦的《装台》和王华的《花城》。

《装台》的主角刁顺子以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讨生计,装台的活计又苦又累,家里的女儿又极不省心,但就是这样一步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使这个十足的小人物别具内涵与光色。王华《花城》中的农村女青年茗花、金钱草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她们因为身份问题只能蜗居于城市边缘。让人为之感动和仰佩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虽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维艰,却能将做人的原则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有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两部作品都着眼于城市里的小人物,但都写出了他们在默默前行中的自持而不自流、自尊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馁。

五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态势,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都是成果丰硕,成就斐然。作家们以敏锐的艺术触角、独特的审美方式、强烈的现实关怀,把笔触深入时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书写中国经验,反映时代精神,以文学的方式向时代致敬,为时代存照。

中短篇小说涌现出一大批为时代造像的优秀之作。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走投何处》不仅书写了进城老人最后的归宿问题,也触及了我们这个年代慢慢积累并逐渐显现的某种时代症候,其中隐含了丰富的现实指向和精神维度。时代的列车轰然碾过,孙桂凤们在陌生的异乡街头茫然四顾,他们究竟该走投何处?这是作家沉重而尖锐的疑问,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将必须直面的困惑和难题。荆禾鸣的中篇小说《北京邻居》几乎以“非虚构”的叙事笔法,勾画了一幅幅“我”的北京邻居们的生活小像。小说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写出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真实生存状态,他们的挣扎和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注脚。小说血肉饱满,弥漫着人间烟火气,有生活质感和精神厚度,凸显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思考者的语言重量。袁山山的短篇小说《意外伤害》以敏锐的笔锋,轻易击中了时代的痛处。小说举重若轻,是对社会病象的有力揭示和批判。作家是对生活满怀困惑的人,或许,作家的困惑恰恰来自于他的清醒。女真的短篇小说《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通过一位夜班出租司机眼睛,窥到了生活深处的漩涡和激流,看到了时代风潮中人的内心波澜和精神起伏,呈现出人物心灵隐藏的悲剧,掀开了斑驳复杂的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现实性题材创作势头强劲,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现实性题材与现实主义手法的齐头并进与桴鼓相应,构成了五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有声有色的发展和稳扎稳打的前行中,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随相伴,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

在直面政治生态,书写政坛生活方面,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等,由惊心动魄的故事,显示出作者大胆揭露政坛时弊的力度。同时,这些作品以对比鲜明的人物,显示出作者审视人性的深度。我在这里之所以回避使用“反腐小说”与“官场小说”的概念,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其内涵上远远超越了“反腐”与“官场”的范畴,在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界人物的高危性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的畸变性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深意、锐意与新意,让人们在认知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政治运作的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反观自我。我曾在另篇文章中提出,以政治小说的概念取代“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说法。政治小说的概念涵盖了“官场”与“反腐”的内容,又大于“官场”与“反腐”的范畴,在内涵与外延上既有一定的规定性,又有一定的包容性,比“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更恰切,也更为适当。政治小说这一说法的具体运用,不仅有利于对已经出现的大量直面社会政治现实的作品作出准确的定位与允当的评估,也有助于使那些饱有政治情结的小说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切近当下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满足人民期许的文学作品,从而推动现实性题材创作向纵深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解放创作生产力的无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名义》在问世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内已印刷了130多万册,创下了近10年长篇小说的畅销记录。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样近距离切近现实并具有政治情怀的作品,是为读者所广泛欢迎的。

还有一些情感题材的作品,虽然都以情感现象为描写对象,但纠葛各不相同,内蕴也各有侧重。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张者的《桃花》、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弋舟的《我们的脚蹼》等,或写困惑中的自省,或写困境中的自救,既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问题,也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小说写法与艺术手法上,不仅不拘一格,而且前所少有的多姿多彩。一些作家几乎是以“中年变法”的勇气,在小说叙事与语言表述上另辟蹊径,寻求自我的再度超越。如荒诞诞于现实的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搬《山海经》于故事叙述的贾平凹的

《老生》,深含象征意味的王安忆的《匿名》,充满浪漫情味的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以拟人手法描写马驹的曹文轩的《火印》,把猪与人的命运勾连起来的李杭育的《公猪案》,借助亡灵的复活来叙事的余华的《七天》、陈应松的《还魂记》,让寓言与现实对接的赵兰振的《夜长梦多》等等。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在意“写什么”,更看重“怎么写”。他们在“怎么写”上的奇思妙想与花样翻新,不仅更新了自己既有的小说手法,而且对整个长篇小说在创作技法上的求新求变,也给予了积极的推进与有力的拓展。

但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还是那些坚持现实主义写法,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以“中国好书”为例,获得2013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金宇澄的《繁花》、贾平凹的《带灯》、王蒙的《这边风景》;获得2014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季栋梁的《上庄记》、杨绛的《洗澡之后》;获得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陈彦的《装台》、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刘庆邦的《黑白男女》;获得2016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鸢》、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这些作品,既都属于现实性题材的发掘与勘探,在写法上也都属于现实主义手法的操持与运用。这些作品的故事与意蕴各不相同,但在直面生活现实,以细节构筑故事,力求再现一定的典型环境,着力塑造典型化的人物上,都有不约而同的共性。

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现实性题材作品,由可触可感的细节、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亲可敬的人物,多角度地表现了当下社会与时代的历史变迁,人们的生活形态与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异。这使得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还缺少那些直接书写改革的火热斗争与伟大进程的作品,缺少那些正面描绘和着力塑造深化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新人的作品,但反映这种深刻历史变革的某些侧影,折射变革引起的心理反应与情绪变动的作品,却更多样、更生动、更细腻、也更充分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有声有色的发展和稳扎稳打的前行中,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随相伴,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动的现实的活动影像。

## 以小说之名抵达时代精神内核

□付秀莹

阔的大时代幕布之下,人性在现实的磨砺和精神的煎熬中起伏不定,小说家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的姿态,引领我们探幽寻微,得以窥见其中令人惊讶的丰富和深度。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把小说比喻成一辆马车,那么语言便是马车的轮子,它能够把小说带到小说应该抵达的地方。毕飞宇深谙此道,短篇小说《大雨如注》让人在惊叹作家笔下功夫的同时,惊叹汉语言的丰饶与美妙。小说从一个细微的切口入手,深深击中当下中国社会的难题——教育问题,这个曾经被反复书写的题材,在作家笔下却云烟满纸,摇曳生姿。这既是叙事的魅力,也是艺术的力量。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里,朴实憨厚的农民宋河因为一个小小善举,引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祸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小说中纷至沓来,令单纯本分的宋河始料未及。宋河内心的疑难和迷茫,正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也是小说着力书写的部分。小说以宋河的生活遭遇为切入点,以独特的文学的方式,写出了世道和人心,写出了时代生活中的纷繁世相,在粗粝的现实主义风格之外,兼有宽阔的审美素质。与众多的底层叙事不同,邓一光的短篇小说《轨道八号线》以良好的艺术耐心,在书写外部世界巨大的

生存压力和物质困境的同时,把探索的笔触伸向底层打工者的内心深处,伸向那些幽暗混沌的未知区域。小说中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年轻人,他们的孤独、迷茫和绝望,他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的精神奔突和心灵辗转,他们人性中潜伏的游移不定的因子,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最终导致变异和破裂,走向毁灭的极端。杨少衡的《酒精测试》里,仕途风云,宦海波澜,或揭批,或反思,或追问,呈现于其笔下的不仅是官场中的“场”,而是官场中形形色色的“人”。小说叙事从容不迫,冷静镇定,却极富内在张力,犹如箭在弦上,写得步步有戏,步步惊心。刘玉栋的中篇小说《风中芦苇》或可视作其乡土经验叙事上新的艺术探索和收获。小说以不同的人物视角,切入中国乡村的肌理,展现了人物不同的命运遭际,而这些人物关系之间彼此勾连纠结,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当下乡土中国的现实场域。小说以沉稳厚重的笔力,鲜活地呈现了这一现实,写得有生活,接地气,及物,且深邃,呈现出某种多声部的审美效果,丰富、宽阔、繁茂而悲怆。此外,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黄蓓佳的《万家亲友团》、陈再见的《回县城》等,都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在深入生活、反映时代精神

中国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一直与中国农村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大致经历了三次深刻的历史变革。第一次是解放初期集体化运动,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应该就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这三次历史变革都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巨大的题材资源,也确实成就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阶段性繁荣。

第一次变革在文学上的呈现主要是以《创业史》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第二次变革带来的主要是以《腊月·正月》《芙蓉镇》等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直面现实,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反响,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其价值和意义多年来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

《白鹿原》的面世时间介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变革的间隙,叙事的时间也从进行时转向过去时,通过家族史的书写,整理并不久远的历史,体现了作家的史诗性追求。《白鹿原》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国内长篇小说写作追求史诗性的风潮,此类题材和风格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究其原因,除了《白鹿原》的示范效应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两次重大变革的间歇期,没有提供足够的题材性资源,可能也是当时小说叙事转向回望的重要因素。

上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叙事特征,就是在历史的标准和美学的标准之间,更多地选择了历史的标准,更多地关注历史而非历史中的人,对个体人物的刻画服务于对历史进程的表现,所以对现实题材本身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叙事角度也大多以第三人称全景式叙述为主。

相比较,表现第三次农村深刻变革的作品,在叙事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多元化特征。在众多的相关作品中,非虚构类作品更多地延续了前述作品的叙事特征,如梁鸿的“梁庄”系列和黄灯的一系列散文等直面这个进程,反响极为强烈。而部分小说作品呈现出新的特质,更多地以美学为标准完成对农村变革的书写,更多地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人物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叙事技法上也不再孜孜以求全景式的呈现和结构上的完整有序。如近两年面世的罗伟章的《声音史》和付秀莹的《陌上》。

《声音史》以声音为重要的叙事工具,通过人物的感觉和命运讲述一个村庄从稳定到衰落的变迁。其叙述是可感的、跳跃的、象征的,历史的进程不再处于叙事的前台,而转入幕后。《陌上》则借鉴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和白描技法,干脆放弃完整有序的叙事结构,冷静地专注于众多人物的描绘。这两部小说给批评和阐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批评界在解读时不再像解读前述小说文本时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产生了不少歧见和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和技法方面,其实结构和技法的变化源自美学原则的变化,就此而言,这两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主要不是源于形式的借鉴,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发。严格来说,它们不宜再被称为农村题材小说,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题材的规定性,题材本身不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而只是人活动的场景而已。

方面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铁腕反腐,从严治党,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形势下,文学如何面对时代的急剧变化,如何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大势,如何关注和介入沸腾的时代生活,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这是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都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有深刻把握的作品。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受到热议,是因为它真实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触摸到时代风潮中人性的奥秘。杨少衡的长篇小说《风口浪尖》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格,以及尖锐的问题意识,把笔墨聚焦于人物的内心风暴和精神困境,写出了特定情境之中选择的艰难以及心灵的激烈挣扎,写出了“风口浪尖”中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海飞的长篇新作《惊蛰》以打动人心的叙事、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诉说家国情怀,抒写人性与信仰,描摹山河与命运、歌颂热血与忠诚。海飞以沉着而激扬的叙事语调,于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中再现了历史深处隐秘的青春记忆,激活了无数青年的热血与理想,壮志与雄心。以文学的方式,致敬烽火年代的无名英雄,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隧道。

5年以来,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作家们都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深入生活,努力把握时代精神,以文学的方式,为我们身处的时代造像,为我们的时代立言,向我们的时代致敬。

从历史到美学:

## 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演变

□陈东捷

